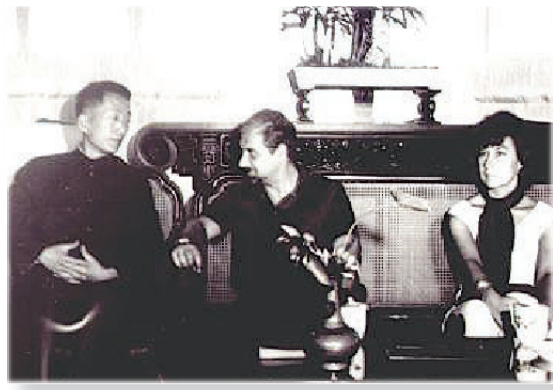


## 沈西蒙和阿根廷作家库塞尼

刘放



不开他军旅生涯的滋养和支撑。

相比之下,执笔写作《霓虹灯下的哨兵》时,沈西蒙笔力更加圆熟,整体把控更加炉火纯青。这部作品的问世,首先得力于新闻媒体。最早是1959年7月23日,上海《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通讯《南京路上好八连》,介绍八连的先进事迹,此后众多媒体竞相报道。沈西蒙看到这条通讯后,觉得题材难得,他秉持一份军人情怀,又是在上海长大,完全能够依据这个框架,写出更加血肉丰满的个性人物来。此后,他和创作组其他成员一起专门到八连体验生活,深入采访四十多天,全部剧的框架日渐成型,人物呼之欲出,他就到苏州闭门谢客,埋头笔耕,写出了话剧剧本。落在稿纸上最初的剧名叫《南京路进行曲》。

在修改过程中,剧名曾先后改为《霓虹灯下遭遇战》《霓虹灯下的奇兵》等,此后在前线话剧团的排演中被正式定名为《霓虹灯下的哨兵》。1963年2月该剧公演后,立即引起轰动,在话剧舞台内外赢得极高的声誉。库塞尼就在这之后不久来中国访问,观看了这部话剧,虽然对汉语台词对白不是很懂,但完全不影响他走进剧情,走近剧作家,对剧赞不已。

说来有缘。库塞尼在上海访问期间,又偕夫人到苏州游览一番,无意中听说《霓虹灯下的哨兵》的主要创作者也在苏州,他立刻向苏州外事办负责接待的陈沧泉提出,希望能拜见沈西蒙,并恳请得到陈的帮助。陈立刻向上级汇报,上级认为这是好事,对促成彼此的文化交流很有意义,于是同意了此事。但这还要征询沈西蒙本人的意愿,他有没有空?是否正忙于写新作品?大家心中无底。陈沧泉抱着试试看的

心态,找到了当时住在苏州市政府招待所“怡社”的沈西蒙。

沈西蒙当时倒是不太忙,但他对库塞尼毫不知情,也没有接触过他的作品,只听陈沧泉单方面的介绍,心中其实也有顾虑。但当他得知对方是一位阿根廷剧作家,不远万里而来,而且比自己年长不少,就觉得自己客观上也算得上半个主人,不答应见面不但有失大方,也有欠礼。于是,中阿两国从未谋面的这两位剧作家,以戏为媒,在苏州拙政园玉兰堂见面了。

宾主会谈中,库塞尼郑重其事地请求陈沧泉用手中的相机为他们拍摄一组值得纪念的照片。毕竟是写戏的人,也能做手势辅表情,库塞尼恳切地表达心意,陈沧泉明白了八九不离十,不断微笑着点头。库塞尼又想了想,突然掏出自己的钢笔,做举拳齐眉状,又原地兜一圈,做出俘虏兵拱手缴枪的动作,伴着战战兢兢、毕恭毕敬的神态,俯首在沈西蒙面前,逗乐了在场所有人。

翻译马上说明了库塞尼的意思,说他非常佩服《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戏,也知道沈西蒙是名军人,他想真诚地拜倒在沈先生的门下,“缴械投降”。军人投降是缴械,他没有枪,手中的笔就代替了枪,要陈沧泉拍下“立此存照”。这位阿根廷作家的确是够虔诚幽默的。

陈沧泉征询沈西蒙的意见,沈西蒙笑着大摇其头,说自己只是小弟弟,对方是老大哥,是尊贵,岂可让对方如此“抬举”。他以主人的姿态,拉库塞尼夫妇在正中的木沙发落座后,又搬来一把椅子,坐在他们身旁以示恭敬,这才示意陈沧泉拍下他们交谈的场景。

其时,沈西蒙没有预料到这次相会后,这部让外国同行大加赞赏的剧作正式“开挂”。1963年11月,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二次进京演出。11月29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该剧。演毕谢幕,全剧团人员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之后,在中宣部、文化部的协助下,地方上各剧种的剧团也都加入《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演出中,大有“一花引来百花开”之势。据统计,当时全国有一百多个剧团改编演出了这部戏。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找到夏衍,要他负责把这个话剧拍成电影,而且有具体要求,即一句台词都不能改,一个演员也不要换。1964年初,同名电影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在南京路实地拍摄,影片很快封镜并在全中国上映。

在以后的岁月中,人们没有见到过沈西蒙用文字记述这段他与外国同行的故事。也许,是他觉得不应该特别张扬自己?或者,是随后的岁月中没有了宽松的心境和氛围,即无从整理这段几乎湮没的记忆?幸亏当时的见证人陈沧泉先生健在,又有具体的照片来“补记”这一段趣闻——让人感到温暖的中外作家间的惺惺相惜,即便相距万里,即便说着不同的语言。

在两位剧作家会面时,所谓的“缴械投降”一出戏,连外行都能看出来是幽默的举动,但也是戏假情真。对方并不是真的要封笔投降,而是表达对同行作品的极度赞赏。与千年前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褒扬,有异曲同工之妙。剧作家沈西蒙于2006年4月28日去世,享年88岁。他的中外读者永远铭记他。

**题图:**1963年6月,阿根廷作家库塞尼(中)与中国作家沈西蒙(左)在苏州拙政园玉兰堂。(陈沧泉 摄影)

## 从问津书院看文化自信

刘新颖

我最初从事天津城市文化研究是工作需要,后来则完全基于个人兴趣爱好,或者说出于私心,出于希望自己孩子传承文化的自觉,因此继续学习以增强自身文化修养。2019年底,我第一次参加问津学术年会,随即加入问津书院的交流研究群,自此“浅者不知其深”这几个字经常浮现在眼前。我为自己研究的浅薄感到惭愧,对书院的组织者及民间派研究者、学院派研究者都充满敬佩,更惊叹于问津书院围绕天津地方文化,多年来累积的丰富民间史料,出版的大量研究成果。

我的孩子出生成长在天津市,从小就喜欢听天津卫的相声,吃食品街的美食。当我问他,相较于父母的生长地,更喜欢天津哪些方面的时候,他的回答除了吃喝玩乐再无其他。高兴于孩子的无忧无虑之外,我也隐隐生出些许的担心。于是,受传统文化“以乡观乡,以天下观天下”这种认识论的启发,我开始带孩子走进各种博物馆,走近天津这座城市。

如果说对传统文化的热忱,使我有文化自觉的素养,那么问津书院翔实的文化资源,则给了我文化自信的底气。空闲时间,我经常陪孩子看地图,有时会带《天津市和平区文物分布位置图》等铺在地板上,一边找地图上的建筑方位,一边听“荏苒芳华·小洋楼的故事”。通过这些耳濡目染,孩子逐渐明白了:吃喝玩乐的烟火气和不拘小节的市井气,出于码头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无奈。中西合璧的风貌建筑,既有抹不去的百年历史的屈辱与风貌,也有值得后人学习的历经世事沧桑人生沉浮之后的低调与气节。有了这样的历史经历,才有了今日天津这样一座城市——她的优点与缺点都摆在那里,她的发展始终在于一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孩子们是关键也是希望。作为母亲,在带着孩子学习的过程中,我自己也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自信,除了自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还得益于在问津书院的几年学习。

“曹雪芹写出了这类人的共同命运,以深邃的思考写出了中华民族艰辛的发展史。他清醒地反思了人才的生存困境,其作品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形上思考。《红楼梦》第二回通过贾雨村‘正邪两赋’的议论,体现出了社会文明进步所需要的人文精神,而这正是今天所稀缺的精神资源。”这段话出自红学家赵建忠教授的文章《〈红楼梦〉第二回的人文精神》。作者显然是想说《红楼梦》,但问津书院某种意义上同样涵养着城市的人文精神。

当孩子们把格局放大,放大到历史长河中,眼里就没有了高低贵贱,只看到五湖四海热爱生活的人会聚天津这座城市,面对现实,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虽然饱经沧桑,历经磨难,但依然积极向上,乐观前行。这就是文化自信。有了这种自信,不论从事何种工作,将来他们都会保有不卑不亢、做好自己的底气。这是做人的骨气,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我们最深沉持久的力量。

浅游在问津书院文史海洋几年,我自身的文化修养与文化自信与日俱增,也看到了天津文史研究焕发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还有它们对这座城市的积极影响。问津书院的交流社群,研究观点、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应有尽有,花样多多,经常能看到不同观念、内容、风格切磋互鉴,乃至讨论争鸣,但所有人对天津文化的自信都深而不疑。

天津这座城市的素质养成,在于城市居民的行为气质、包容心态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这些都离不开地方文化的传承与滋养。城市更新发展,其根在于文化。文化和城市的繁荣发展,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因果必然。问津书院经过十余年沉淀,凝聚了共识,扎牢了根基,动员了人心,这样的因果必然,使得书院找到了服务城市发展的机遇。

任何时尚都是一个渐变过程,不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海派家具形成独特风格,可溯源自清代乾隆年间,当时大量洋货从广州涌入,随后迅速流布到江南一带,欧洲的绘画、雕刻、钟表、家具,甚至包括洋花边、纽扣这些微小的货品,只要与“洋”字贴边就会成为时尚。

## 洋建筑在家具里

姜维群

但仅仅有这些还是不行,圆明园的兴建是清代宫廷建筑引进洋建筑风格最有力的示范。随着清政府被迫开埠,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等一批城市出现租界或租借地,洋建筑在封闭的华夏大地合法地兴建。地表的建筑物和建筑物内部的家具永远是如影随形的,建筑的洋化必然导致家具的洋化,天津洋家具、海派家具领风气之先。

上海“十里洋场”不仅改变了建筑民居形态,人也发生了变化。清人黄协埙《淞南梦影录》中说:“游手好闲之辈,略习西国语言,结伴伺捕上,遇有兵船水手及西商之初至沪地者,即导之游览,并代购食用等物,欺其价值未谙,大可从渔利。”把握商机也是一种时尚。在恢宏的洋建筑里,家具已成规模。

海派家具蕴含大量的“建筑符号”,最明显的就是用机床刨出的各种腿,像方锥形、凹槽式、弧弯式、纺锤式、圆柱式等,这些都是工业机器生产介入家具制作的标志,是民国家具区别于明清家具的明显印记。

细观这些家具腿会发现,其与洋建筑的栏杆属于孪生兄弟。石库门和花园洋楼增加了阳台露台,围栏栏杆成了一道风景线,于是也被海派家具借过来,作为大衣橱帽檐装饰、梳妆台与桌椅的各式纺锤形围栏装饰,十分洋气。

古希腊、罗马建筑式在海派家具上反复出现,说明家具与建筑密不可分。还有巴洛克式的螺旋柱,也被广泛运用到天津洋家具和海派家具中。建筑的“洋符号”被借用到家具上,形成天津洋家具、海派家具抹不掉的时代特征。

里飞满了蝴蝶。《乔乔的异想世界》在人物塑造上很成功,每一个人不管出现时间长短,都能让人印象深刻。其中最让人惊喜的是妈妈的饰演者斯嘉丽·约翰逊,把一个快乐、自由、有爱心的妈妈,以惊艳的方式呈现出来。

即使在那么黑暗的年代,亦有善良人性的闪光,就算隐藏在墙壁阁楼间,也值得守护的光芒。《乔乔的异想世界》从头到尾都用一种童趣戏谑的方式,告诉我们不该忘记那段历史。

8月12日22:28 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乔乔的异想世界》,8月13日14:39“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 王进福刻兔

崔锦



《巧夺天工》这本书上讲:“王宝堂,民国初年天津人。擅剪纸,能剪各种花卉、草虫,是天津著名的剪纸艺人,曾在天津东门外开设进宝斋卖艺。”后来在天津市以刻花卉、草虫著称的伊德元,就是他的得意门生。

光绪末年,天津还没有专门从事刻纸的艺术家,但市民对刻纸的需求量大,正如周楚良在天津年俗诗中写的那样,“先贴门笺次挂钱,撒金红纸写春联,竹竿紧来横管帚,扫房糊窗算过年”。这首诗把天津人过年贴春联、贴压岁钱、糊窗花的民俗写得全面,这也说明天津人过春节时时刻刻的需求量多么大。

据刻纸艺人任文鸿讲,每逢春节临近或庙会期间,保定府的何、王、刘三位老艺人就带着包裹来天津出售自己的刻纸作品。后来,何老艺人把手艺传给了任文鸿。王宝堂和刘氏艺人分别开设了进宝斋和义和斋刻纸店。看来,王宝堂并非《巧夺天工》上说的是天津人,而是河北保定人。

王宝堂,字进福(下文均称王进福),其刻纸店名进宝斋,就是从其名和字上各取一字组成,店铺坐落在东门外大街上。王进福的刻纸运刀之法如书法运笔之法,完全悬肘,全凭腕力,且是从后向前运刀,因此,线条灵活,变化丰富。王进福还走街串巷到津门巨商富贾家中推销其作品,并根据买主的意见和要求不断改进技艺,受到买主们的欢迎,成为天津市最著名的刻纸作坊。王进福年纪大了以后,把进宝斋兑给了伊德元,但他还时常拿作品要求伊德元为之代售。伊德元曾和我说:我刚接手进宝斋,没有开店的经验,当时的业务很不好,王进福还要我代售他的作品。说着,他把王进福要求为其代售的兔纸约30余幅拿出来送给了我。

王进福的这些刻纸作品,有兔子图案的竟达20余幅,还有几幅蝙蝠、牛、花卉等作品。我就想王进福为什么在店里寄售这么多兔子形象的作品呢?因为120年前的1903年正是癸卯年(即兔年),当年王进福刻这么多兔子的作品就是在迎合市场的需求。这些兔子有的在闻梅花,有的在啃萝卜,有的在啮合白菜……但无论哪只兔子,其眼睛总是机警地关切着四周的环境,防备着偷袭者。王进福以高超的技艺,把兔子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 满庭芳

第五一七三期

“我叫乔纳斯·德特莱夫·贝泽勒尔,小名乔乔,1927年3月25日出生于维也纳。”这句台词出自影片《乔乔的异想世界》。本片以一个10岁孩子的奇幻视角呈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惨历史。

《乔乔的异想世界》上映于2019年,由鬼才导演塔伊加·维迪提执导,这位生于1975年的新西兰导演,集奥斯卡金像奖、英国电影学院奖和格莱美奖于一身,同时也擅长表演。在其执导的《雷神3:诸神黄昏》中,就饰演了石头人寇格,个性化的诙谐风格带入片中,一改漫威影片的严肃感。另一个角色机器人IG-11,则出自剧

## 《乔乔的异想世界》:值得守护的人性光芒

何映晖

交、尊重法律、整饬教育、开发利源、崇尚公德、化除私谊”为治民、治军信条,其治下五省成为以军绅为基础的独立王国,他本人也成为“东南王”。孙传芳统治东南五省时,网罗人才,向张春“问道”,请陈陶遗出山,扫日除弊,革故鼎新,吸引了章太炎、李根源等一众名士。五省民众生活也相对安定,经济日益繁荣。在此背景下,孙传芳又提出“大上海”计划,“改变上海市、闸北、沪西、浦东、吴淞地区互不统属的状况”,“把租界四周的中国地区统一起来,建立一个行政总机构,即淞沪商埠督办公署”,与陈陶遗商讨,欲令学者丁文江全权做督办公署总办,“把上海交涉使、上海道尹、上海警察局局长,都指定为督办公署的各司当然首脑”。此“大上海”计划,在当时确是创举。1926年5月5日,孙传芳宣布《淞沪商埠政方针》,请丁文江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全权总办。



## 孙传芳旧宅:“五省联帅”的最后时光

孙爱霞

前茅”。1903年,孙传芳与杨文恺入北洋陆军武备学堂,次年齐赴日本东京振武学校留学。在振武学校,孙传芳读到李烈钧所传一份留日学生革命刊物的创刊号,一度欲入同盟会,为杨文恺所阻。1907年11月,孙传芳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1908年12月毕业,1909年3月回国。其时王英楷已投靠铁良,官至陆军部右侍郎。在王英楷授意下,孙传芳至天津直隶督练公所报到,旋即参加陆军部甄拔考试,成为步兵科举人。不久,铁良被排挤出核心,王英楷也失势病死,孙传芳则暂且蛰伏。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传芳在汉口之战中“立得头功”,得王占元称赞,调任北洋陆军第二师师重第二营营长。二次革命爆发后,孙传芳抢占湖口,迫使革命军第五旅团退守吴城,获袁世凯嘉奖,升任第二师步兵第六团团长。1916年王占元升任湖北督军,孙传芳升任第三旅旅长,旋任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战场上,孙传芳骁勇善战,曾与湘军某部大战八昼夜,成就威名。王占元下台后,孙传芳改投吴佩孚麾下,但貌似恭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孙传芳选择观望,待张作霖退守关外,立即发表主张恢复法统之通电,公开表示对直系政治主张的支持。继又发电请南北总统下台,敦请黎元洪复职。为酬答孙传芳劝进之功,黎元洪任命孙传芳为陆军上将。1922年,孙传芳受命发兵援闽,于1923年1月入闽,3月被任命为福建军务管理。1924年9月,江苏齐燮元与“沪浙王”卢永祥起战事,孙传芳出兵援齐,一路打到上海,卢永祥通电下野。与此同时,张作霖出关,通电讨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曹錕、吴佩孚兵溃势弱,段祺瑞上台执政,令孙传芳撤兵回浙,督办浙江军务。孙传芳选择表面与奉系将领修好,退出上海,韬光养晦。

1925年秋,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兵分三路出击,席卷苏皖,直至山东边界。在与张宗昌部交锋时,俘虏并杀害了济南镇守使施从滨,为自己种下因果。孙传芳取胜后,筹建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设总司令部于南京。孙传芳“统一军权、实行民治、财政公开、罗致人才、慎重外交”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与吴佩孚军队交战。最初孙传芳是被蒋介石安抚的对象,而他也希望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故而选择按兵不动。吴佩孚很快便自两湖退守河南,国民革命军挺进江西,孙传芳始参战。但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孙传芳退守南京,此际东南五省已失两省,剩三省将领也不与之同心,故而孙传芳即便亲自来北联奉,亦属进退两难。1928年春,孙传芳退至济南,后又退至冀东滦州一带。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孙传芳残部被阎锡山收编,孙传芳则出关投奔张学良。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孙传芳本已投军奉天居住,但杨宇霆被张学良决一死令其不安,遂于1930年1月离开奉天,避居大连。“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派人至大连劝孙传芳出任东北治安委员会委员。孙传芳不欲为汉奸,遂举家迁至关内,于1931年10月2日抵津,并发表声明称“绝未担任日军所委任‘东北治安维持会委员’等职”。自此,孙传芳一家便寓居天津。1933年,孙传芳购入前财政部长张弧洋房,整饰一新后,全家搬迁至该洋房生活。

晚年孙传芳放下屠刀,皈依佛门,成为居士,但早年杀害爱尼克的枉死。整座建筑是典型的古典主义风格,在当时是极尽奢华的一株住宅。(节选,有改动)

## 《小楼春秋》解说词:

法国建筑师穆勒在天津设计了很多知名建筑,如劝业场、工商学院大楼、交通饭店、渤海大楼,这个是穆勒在天津留下来的最大的一株住宅类的设计建筑,是给张弧设计的一个住宅,整个住宅是两层砖混结构,入口处是四个爱奥尼克的柱式。整座建筑是典型的古典主义风格,在当时是极尽奢华的一株住宅。(节选,有改动)



扫描二维码,观看本期节目视频。